

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

第二辑

蟬香馆使黔日记

上

原著
严修

点校 汪文学

丛书主编 汪文学 刘泽海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

第二辑

蟬香館使黔日記

上

原著

严修

点校 汪文学

丛书主编 汪文学 刘泽海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乙未 正月初一日 駐署獻歲至
四月三十日 大定試院校射



隨二十一年乙未正月初一日癸酉陰

卯初起 赴萬壽宮詣皇恩以下畢至又刻許署撫中

亦到同詣正殿階下行禮 撫中學校正孫在馬一

班司道以下各就其班之位 贊贊行三跪九叩禮畢少

坐而散 士著時先高翔順經官廳乃為朝冠加披肩初刻不

歸時恆款拜年 校場集道者約五六人 辰酉四著

葉御病者夜間順著腹內覺不遂問答幾久云其意當某

病不能睡以沈沈鼻入洋香吸余之烟鼓乃如佳談之初吸便

有睡意再吸則沈沈睡矣至曉乃醒神氣亦明日人交簡

于後睡一時許 晚題學校全書四也仍回右任字

今日去校又非命長僕房掃房有又兼當日便至云必拘
而末過初三之例也今日又自唐、
燦時之屏終日不絕 却又由舊任移在兵部澄見鈔目
初二日 甲戌 陰 晚見夕陽甚昏 及晚時

辰正起 看書致全書 看藝文書何厚主一

收文一件 吳化影字中仙山縣補陳確全丁且各房款

會尚德書

貴州守兵勇二千有奇戰長二千有奇戰共由保營以律守
如字兵仍保營也命之不足三人旅防四口兵兩旅營某州
行旅營由四口巡防四口兵營是也先由首在者旅八營兵
十餘名知守營勇 為云

會長根在

日記原稿

本书获

2018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凡 例

一、丛书命名为“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实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黔籍文人撰写的日记，包含黔人在黔地和外地撰写的日记。二是外籍文人在黔地撰写的日记。或为黔地文人写的日记，或为外籍文人在黔地写的日记，虽题名易生歧义，然目的是为全面呈现黔人的日常生活和黔地的地方性知识。

二、丛刊收录日记文献，起于明代，迄于1949年。明代以前贵州无日记文献传世，现存黔人撰写日记最早者，是杨文骢《台荡日记》；外籍文人在贵州期间所写日记传世最早者，是徐霞客《黔游日记》。贵州日记以清季民国居多，故丛书命名为“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

三、丛刊所收日记，有稿本、抄本、刻本等。凡为古近代黔地文人所撰日记，外籍文人写于贵州期间的日记，皆尽力搜寻，整理收录。

四、丛刊所收日记，凡黔地文人所撰者，皆全文收录；凡外籍人士所著者，或全录，或节录，视具体情况确定。

五、丛刊以类编录，分辑出版，分册印行。凡篇幅较大可独立成册者，单独成册；篇幅较小者，则以类相从，合编成册。或一人数种而合为一册，如黎恂；或时代相近而合编成册，如清代宦游于黔者之日记；或主题相近而合编成册，如抗战期间流亡于黔者之日记。要之，视情况而定，以便观览。

六、丛刊收录日记若干种，于书首冠以“总序”，总论日记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说明丛刊的编纂缘起和编辑旨趣。于每部日记前冠以“前言”，介绍作者生平行状、日记写作之背景，评估日记所具之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说明本书整理所据之版本情况。

七、丛刊以标准规范之简化字和现代通用的标点符号进行整理，横式排印。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繁体字径改为标准规范之简化字。人名、地名、机构名中若无对应的简体字，则不作改动。

八、原稿漶漫不清不能准确辨识者，用（ ）注明；有完全不能辨识者，用□代表；有脱字、衍字、误字者，以脚注改正；有眉批者，以脚注示之；有双行小字者，以小于正文字号单行排印。

九、原日记中有对少数民族或地方人士之轻侮性称号或恶性性评说，或因政治立场之差异而发表的攻击性言论。丛刊本于文献整理之通行原则，保持文献原貌，不作更改。

总序

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贵州古近代地域文献，是我们近年来特别关注的事情，亦是我们学术团队开展的中心工作，“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经过长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如今丛刊即将陆续出版。故著此序言，略述本丛刊之编纂缘起和编辑旨趣。

一

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叙事模式或研究方法：一种是以王朝政治为载体，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叙事模式，通过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政治的研究，自上而下的寻绎传统中国社会的演进轨迹，此为宏大叙事和宏观研究。一种是以日常生活为载体，以个人或地域为中心的叙事模式，通过对个人日常生活的研究，对特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的发掘，自下而上地呈现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此为微观叙事和微观研究。随着“新史学”之学术观念和研究方

法的逐渐成熟，及其深入人心的影响，相对于宏大叙事和宏观研究而言，对历史细节的微观研究，对作为历史之主体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之意义的呈现，对特别地域的地方性知识的关注，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和地方性知识以呈现整体历史的长时段演进规律，逐渐为学者所认同和采纳，并成为一种颇具学术活力的学术研究新动向。

此种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转向，是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宏大叙事和宏观研究，在呈现长时段历史发展之趋势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因其有不可避免的空疏之嫌，而常常遭遇学者的诟病。因为历史总是由若干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若干地域的地方性知识所构成，宏大的历史叙事总需建立在日常生活细节和地方性社会经验之基础上，离开了对个人日常生活意义的诠释和地方性知识传统、社会经验的发掘，宏大叙事犹如聚沙成塔、空中楼阁，其可靠性令人置疑，其危险性显而易见。

历史由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构成，历史又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历史研究当以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和人物为核心。或者说，人物和事件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才有意义，其意义亦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所以，历史研究当是对特定时间和空间背景下活动着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并进而呈现其活动或发展的规律。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素。比照传统中国的史学体例，以时间为核心要素的是编年体，以地点为

核心要素的近于国别体，以人物为中心的是纪传体，以事件为中心的是纪事本末体。

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说，虽是就读《诗》而言，实际上亦可作为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今人解读文学作品，一般是首先考察创作此作品之作家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性格，是为“知人”；其次考察作家创作此作品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背景，此为“论世”。所以，“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虽然遭到新批评家提出的“感受谬误”和“意图谬误”说的冲击，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因此，在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中，为作家编年谱，为作品系年，仍然是学术界特别强调的文学研究的前提，是文学研究者的基本功夫，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作家和作品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准确定位。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精准定位，达成对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的准确理解。文学研究如此，历史事件之研究亦不例外。任何历史事件皆是特定历史人物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发起的。所以，关于历史事件的解读，“知人论世”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通过排列刘氏父子年谱的形式，呈现出西汉末年刘氏父子在学术思想活动中的若干细节，及其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从而揭穿了长期以来流行于学术界关于刘歆伪造古文经的学术谎言。

总之，地方性知识虽然琐碎，日常生活细节虽属个案，但它们是构成历史的基本要素。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

律，往往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地方性知识和具有个案特征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呈现出来的。因此，历史研究由宏大叙事向历史细节的演变，由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的发展，从学理上看，是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

呈显日常生活细节的方式很多，年谱和日记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方式。但是，就其呈显的精准性、具体化和私密性而言，日记远胜于年谱。或者说，日记是对个人日常生活细节最精准、最具体、最真实的呈现。概括起来，日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精准性。日记的精准性远胜于年谱，这是由日记的写作方式决定的。一般而言，年谱往往是由他人编写的，虽然亦有谱主自编年谱的情况，但并不常见。而日记则完全是由本人撰写的。自撰日记记录本人的日常生活，肯定比由他人撰写的年谱，更具精准性。再说，无论是自编年谱，还是由他人编写的年谱，均是事后的追叙。自编年谱，多是在晚年光景对一生行事的追忆。由他人撰写的年谱，则常常是谱主去世后由他人撰写。无论是自己的追忆，还是他人的追叙，均是在事后若干年进行的，故而皆有失真的可能。或者仅仅记下能够被追忆或追叙的部分，而遗忘或遗失其中的诸多细节。或者在追忆或追叙中不可避免的有误忆或误叙的内容，总之，失真不可避免，因而其精准性便要大打

折扣。而日记则是由记主逐日所记，或当日所记，或间隔一二日追记。不仅能完整记录若干生活细节，而且一般不会失真，除非是有意回避。所以，日记的精准性超过年谱，不言自明。

其二，具体化。日记的具体化亦远胜于年谱，这是由日记的写作形式决定的。古代的年谱和当代学者为古人编写的年谱，由于史料的限制，往往是按年编撰。晚近时期的年谱，亦有具体到月日的，但一般多近似于大事记，即主要记录谱主一生中经历的比较重要的事件，日常生活细节往往缺而不录，或是不需记录，或是因史料的缺乏而不能记录。即便是谱主自撰年谱，亦常常如此。日记则不同，它非常具体，在时间上，它必须具体到日，否则不能称为日记。甚至具体到时刻，包括起床、就餐、会客、睡觉等具体时刻。一般亦记录天气，气候环境对人的情绪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不仅记录一日生活之细节，还记录一日情绪之变化。因此，可以说，日记呈现的才是最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其具体化，远远超过年谱。

其三，私密性。与年谱相比，日记的私密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年谱来说，无论是他撰年谱，还是自撰年谱，撰写者皆是当作著作来写的，其意欲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目的是显明的。因此，年谱一般不具备私密性，亦较少流露个人情绪。而日记则不同，虽然亦不乏记主为发表或传世的目的而创作的日记，故而较少叙说个人隐私或个体情感。但是，在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日记在写作时，记主并非是为了出版或传世，而是把它当作自我交流和自我反省的载体。在写作日记时，记主往往是自言自语，通过笔端下的文字，清理思路，整理情绪，调整心态。通过自我交流，实现倾诉欲望。通过自我反省，达成改过自新。无论是自我交流还是自我反省，皆可能暴露个人隐私。所以，日记中有较多的情绪或情感的流露，私密性极强，亦更能体现记主的真实自我，更能呈现记主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内心秘密。

总之，日记具有精准、具体和私密的特点，真实再现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内心隐秘，精准呈现个人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因而受到晚近学者的重视，成为“新史学”研究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史料。日记写作之被文人重视，并成为一代文人的风气，是在晚清民国时期。而“新史学”之兴起，“新史学”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之形成，重视日常生活细节和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亦基本上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日记写作之渐成风气，与重视日常生活细节研究之“新史学”，大体同步出现在晚清民国时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至少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互动影响关系。

关于如何利用日记来研究历史的问题，桑兵先生的见解值得参考，其利用日记研究历史的方法值得借鉴。他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一书中，专著“日记内外的历史”一节，分析了日记作为史料的种类和属性，提出了利用日记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他认为：

“要把日记当日记看，不能泛泛而论地仅仅作史料看。”因为这样“容易以己意从中摘取片断，割裂作者原意，而组成另外的意思”。因此，他建议：“不要以某一种日记为信史，应将各种相关日记相互参看，以求近真；不要简单地以为日记即第一手材料，应将各种文献比勘印证，以便把握其中真的成分和真的程度，不要以日记所记即为全部事实，应掌握基本事实来看日记所记；不要仅仅从日记中各取所需地寻找自己要的材料，而要了解记日记之人的为人行事及其记日记的习惯方式。”^①在这种日记史料观的指导下，他著有《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②一书，选取清末民初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者四十余人的日记，按时间顺序将各人的日记内容进行年谱式的排列，对1911～1912年间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动荡以及时人的骚动和不安，进行描述，讨论在这个重大历史变革时刻不同亲历者的心态及其对当时社会变革的观察。这种做法别开生面，虽然在具体日记史料的取用上亦颇遭学者的批评，但他的确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开辟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应该引起学者高度重视的。

①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4～95页。

② 桑兵：《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三

近年来，受“新史学”学术思想观念的影响，受人类学学术研究方法的启示，我对地方性知识和个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研究，甚为关注，并有浓厚兴趣。同时，作为一名黔中子弟，作为一名在黔中这块土地上教书育人并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出于回报桑梓、感恩故土和宣扬家乡文化的个人情结，我对地方性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关注，重点放在贵州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上，以及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探索上。整理贵州地方文献、关注贵州地方性知识，研究贵州地域文化和文学，呈显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便成为我近年来的主要学术方向。

我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五年，主要从事地方特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追溯我对贵州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贵州古近代文学理论辑释》一书就是在这段时期做出来的。后来又在文学院工作过五年，主持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设以地域性、民族性和应用性为特色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带领团队侧重开展贵州地域文献、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亦以身作则做一些具体的研究项目，《道真契约文书汇编》《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研究》《贵州地域文化精神研究》等著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来的。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热衷于贵州地域文献、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还存有另外一个学术野心，即通过研究，建构一门具有特色的中国地域之学——黔学。鉴于贵州地域文化与文学长期以来处于一个被轻视、被忽略和被描写的尴尬地位，因而构建黔学可能会遇到诸多障碍和质疑，甚至有“夜郎自大”之嫌疑。黔学能否为“学”？构建黔学有无学理依据？这是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我认为，黔学之所以能成为“学”，是有充分学理依据的。“多山多石”的山国地理和“不边不内”的通道地位，以及“割川、滇、湘、粤之剩地”而构成的区域地理和因之而形成的“五方杂处”的地域文化，及其以“大杂居，小聚居”为特点的民族分布格局和因之而形成的“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使贵州的地理特征、地域区位、人文风尚、地域文化和民族性格皆自成一体，与其它地域相比，皆有相当明显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所以，以自古及今与黔地、黔人相关的精神文化为核心内容，建构一门有别于其它地域之学的黔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亦是有学理依据的。

构建黔学，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黔学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因此，近年来，关于贵州地域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便成为我和我的学术团队集中致力的工作，如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贵州古近代珍稀家谱文献、中国西南布依摩经抄本文献、贵州彝族古抄本文献等大型地域文献和民族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皆在积极筹划和有

序实施中。“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的编纂出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并实施的。

尽力搜集，持续整理，陆续出版，以期有更多的日记被发现，被整理，得到出版，是编者的心愿。故此尚需境内外学人添砖加瓦，共襄盛举，或提供线索，或协助搜集，或参与整理，皆是我们所需要的，亦是我们特别感激的。

汪文学

二〇一七年二月五日于花溪